

马场道与赛马会

金彭育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河西区委员会 编

海河两岸记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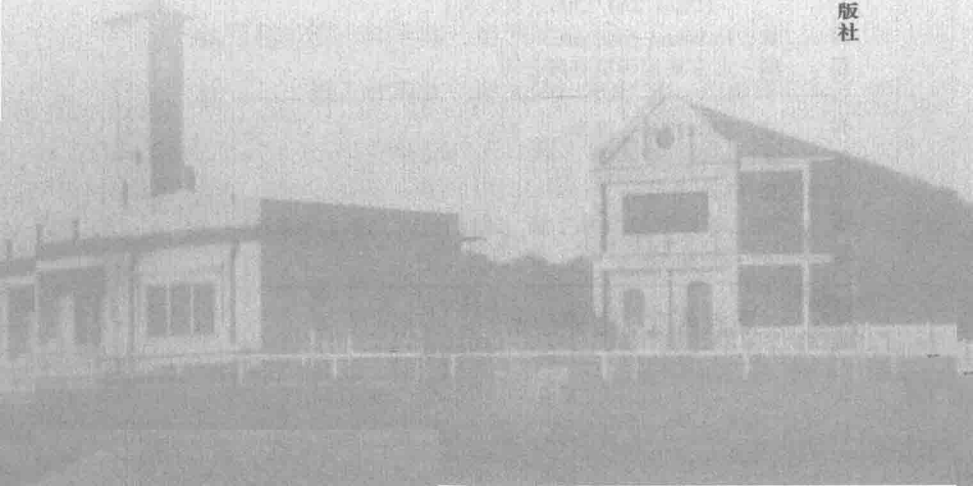
马场道与赛马会

金彭育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河西区委员会 编

海河两岸记忆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场道与赛马会 / 金彭育著. — 天津: 天津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 2018.12
(海河西岸记忆丛书)
ISBN 978-7-5563-0541-4

I. ①马… II. ①金… III. ①文化史-天津 IV.
①K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301876 号

马场道与赛马会
MACHANGDAO YU SAIMAHUI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 张博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0165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 址: www.tass-tj.org.cn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海河西岸记忆丛书》

编委会

主 任：李耀进

副 主 任：邢德惠 吴兴东 刘惠庆 毛 英
刘庆荣 杨玉芬

委 员：肖云强 韩 宁 于凤英 张宏伟
王卫荣 谢 斌 郭泽濂 赵津旭
章用秀 罗文华 张绍组 金彭育
尹树鹏 齐 珏 魏暑临

执 行 主 编：章用秀 罗文华 杨玉芬 于凤英

执行副主编：郭泽濂 赵津旭

编 辑：章用秀 罗文华 张绍组 金彭育
尹树鹏 齐 珏 魏暑临

序

杨大辛

我与河西区可以说凝结了深厚的乡土情缘。1925年2月我出生于河西区(当时称特一区)三义庄宝德里,此其一;1952年5月我定居河西区(当时称第六区)福建路,从先严至后辈子孙四代人先后在此居住,此其二;1978年6月政府安排我到市政协主持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从而与河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始终保持协作关系,在我离休后个人依旧与区政协文史委长期往来联系至今,此其三。回顾我这一生虽然历尽坎坷却始终勤奋敬业,得以在编史修志事业方面有所成就,心安理得。我在河西区居留六十余载,可以说这里是我安身立命之“福地”。

河西区政协的文史工作,多年来始终与时俱进,成绩斐然。近日获悉,正在着手汇编《海河西岸记忆丛书》,涉及有关海河西岸的历史变迁、风土民俗、名人逸事等诸多方面史料,工程浩繁,目前正在紧张编写中。未读书稿,何以评说?得悉各册撰稿人如章用秀、张绍祖、金彭育、尹树鹏、齐珏诸君,都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治学严谨,文笔流畅,各自完成精心制作,当可期待耳!

河西区政协李耀进主席嘱为此丛书写篇序言。我虽已挂笔数载,承蒙如此厚爱,情不可却,遂信笔谈了以上几点感知,聊以复命,不成体统,尚祈谅解为盼。是为序。

2018年8月

河西历史文化概论

尹树鹏

河西区被人们亲切地称作海河西岸。她以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天津地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将她的历史文化写出来、讲出来会让河西人充满信心地实现中国梦。

河西的由来

天津是海河及其支流孕育出的城市，到清代老城以外的居民聚落，都沿河而成，还都形成了有名有姓的村庄。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它们逐渐融合在一起，成为我们现在的成片社区。天津中心城区最早的地名是金代坐落在三岔河口地区的直沽寨。到元代改称海津镇，在三岔河口及其下游建立了漕运管理的中枢，即大、小直沽。1282年全部改为海上漕运后，大型海船从南方沿海绕过山东半岛，进入渤海湾，沿海口到大直沽停泊。此地宽阔的河面上聚集着大吨位的漕船，为加强管理，海河下游成为漕运大动脉。直沽南部地区河面宽，两岸阔地多，故形成大码头被叫作大直沽。北部的三岔河

口一带,河汊多、水面窄,被叫作小直沽。大直沽遂成为海漕的中枢。到元代延祐年间,大直沽已成为保障元大都粮米供应、海路漕运的终点码头。也最先成为天津地区海河岸边第一个行政中心。明代胡文璧写道:“元统四海,东南贡赋集刘家港,由海道上直沽,达燕都。舟车悠会聚落始繁。有官观、有接运厅、有临清户府……”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这是历史事实。河对岸却叫小刘庄,似乎两者没有什么历史渊源,一块出土的墓碑将两个村庄联系了起来。

1954年在浦口桥出土了一块黄溥的墓志,碑文上刻有:“奉柩于静海县大直沽河西祖塋之次。”黄溥是卒于1520年的天津左卫指挥,是明代天津早期的高级军官。这个墓碑再次直接证明了河西的小刘庄地区和河东的大直沽地区是一个整体,只是当时尚未独立。还证明了小刘庄地区的村落形成于元代,远早于其他形成于明清时期的村落。不是《津门保甲图说》标明的清代村庄。《津门保甲图说》是天津官方首次对天津县全境村落进行户籍调查所做的图示文字说明,它只是现状调查,其价值是用图示表明了当时各村落的相对位置,为研究村落在道光年间的状况有了精确记述。但要追述各村来历尚要有以前文献进行考证,绝不能根据“图说”而认为它们都是道光年间形成村落。天津官渡修建的文献也说明了小刘庄早在明朝之前就是村落的依据。明万历十六年(1588)天津兵备道查志隆命天津三卫经历司造渡船,设渡口八处,其中就有大直沽渡口,这是八个官渡口之一。西岸正是小刘庄村,与它相连的诸多村庄都没设官渡,说明大直沽西岸与东岸繁荣同步。之所以不提出小刘庄村名仍然是将两岸当作一个整体村子来看。而后西岸逐渐发达壮大,有了独立资格,以村中大户刘姓

为村名也自然了。小刘庄的“小”并不是规模小而是和大直沽的“大”相对应。村中建了关帝庙就是村子独立的象征。1923年刘庄大街东口所建牌坊上面镌刻的“刘庄大街”四字为大直沽的书法家李学曾所书,也说明了二村斩不断的社会关系。各时期的地图都绘出小刘庄大街和大直沽中街隔河相望,所以在海河西岸众多村落中,小刘庄早在元代就出现了,在明代其规模和繁荣程度都大于其他沿河村庄。在清代独立后有了小刘庄村名。它就是河西地最早的村落,是海河西岸向城市化发展的原点。

海河西岸北国江南水乡的原生态

海河平原地势低洼,海拔仅3~5米。流水不畅,使海河的河道成为羊肠状。大小河套在环抱处产生了相对应的环水高地——沽。沽给人们在岸边水旁生活创造了条件。河西地区因处于海河上游河道弯曲最多的地段,就成为古代海河沿河村落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早在宋代已有三女寨(现灰堆一带),元代沿河居民开始增多。到明代有名有姓的村庄已很多了。1404年(明永乐二年)三岔河口建城设卫,城的北门与东门外很快繁荣。到1902年又向东北方向开辟新河北地区推行新政,天津城市化的过程基本完成。河西地区距老城较远,没有参与天津旧有商业带和文化带的发展,而是以独特的原生态农耕区成为起点并以天津农耕文化的源头成分融入天津市区。1404年明王朝在下令设卫的同时又下令在天津屯田,到后期已成高潮。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官员汪应蛟经过观察分析认为,海河沿岸土地非常肥沃,但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挖沟筑埝定成膏腴。他亲自组织开垦了贺家围、何家围(现上下河圈一带)等十围屯田。其中何家围就是十字围中距天津城最近的一围。到天启年间,左光斗又将屯田与办学结合,安排卢观象增垦4围屯田。现河西地区的陈堂庄(现陈塘庄)、土城、东西尖山、何家圈(现上下河圈)、寇家口(现贺家口)等村落已是鸡犬相闻,鱼蟹举纲、风景依稀,绝似江南。这次在贺家口以南共垦出良田3000亩。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天津总兵蓝理又在城南开垦水田近200顷。河渠圩岸周数十里,其范围北从马家口,南到贺家口,西至八里台,东到海河边,全是水田漠漠,十里稻香。改变了以前城南水乡泽国没有人烟的状况。完成了农业区域向北推进与城南连成一体,到雍正五年(1727)贺家口地区已出现2~3穗的水稻变异品种。清代诗人姚承丰写道:“十字围,获早稻,车戽声中波浩浩。七十二沽云水乡,半是捕鱼不插秧。”汪司农,蓝总戎,能以人力夺天工,二千余亩分田界,葛沽以北白塘东。秋色红莲稻花吐,直使斥卤成膏土。吁嗟乎,十字围,非小补而后。卫青萝卜在小刘庄已育成优良品种,佟楼地区出现了奶牛、蛋鸡养殖业,河西地区成为天津新型农业的代表。其农耕生态景观一直延续到1900年前后。这种多水的田园风光使贺家口引河沿岸出现了众多的私人园林,如:桃园、蔡家花园、丁家花园、倪家花园等,成为天津南部最宜休闲的地区。

现代工业强区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是西方工业文明的青年时代，科学技术快速推进了社会的繁荣和经济实力。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遂成为京畿地区吸纳工业文明的首座城市。工业建设率先在海河西岸驻足，这是因为海河东岸多为储盐的盐坨分布区，与城里又隔河相阻，而海河西岸河堤以外多坑塘荒地，地价极贱，与城里又畅通无阻。此时的货物运输以水运为主，海河西岸就成了修建码头的理想区域。吸引了最早一批民族实业家在此投资建厂。其代表是：中国第一家机制面粉加工厂——“贻来牟”。贻来牟在紫竹林庙宇以南，轮船招商局码头区域内建成，清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与点评：“机器制造创于泰西而效行于中国。五年以前，粤东购有织布及轧花机器两架，华人耳目为之一新。天津麦面盛行，今秋又有宁人购来磨面机器一座，在紫竹林招商局下开张磨坊，名曰‘贻来牟机器磨坊’……”出面极多且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然不同，现已远近驰名。又报其每年可获利六七千两白银。其创办人即为招商局会办朱其昂。

1884年，在与英美租界毗邻的海大道一带，广东人罗三佑创办了德泰铁工厂为船舶、矿业提供修配服务。1886年，以制作小型铁质器具为主的万顺铁工厂也相继出现。这一年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相约中外股东购地64亩在河西贺家口建成天津最早的大型火柴厂——天津自来火公司。之所以在这建厂也是因为运输制造火柴用的优质木材便利，到1900年以前

海河西岸就已成为天津民族工业最为集中的区域。该地区是天津近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天津第一家火柴厂“天津自来火公司”、天津最早够规模的现代化地毯厂“玉顺永”率先在此区域建成,并带动了周边形成了地毯厂集中区片,使该地区成为中国地毯的摇篮。1918年建成的“裕元纱厂”是天津规模最大的纺纱厂。天津最早的内燃机厂、最大的制革厂和印刷设备始终领先的天津印刷厂也都诞生在该地区。其中建在小刘庄海河边的裕元纱厂由王郅隆、倪嗣冲等人集资556万元,是天津当时规模最大、获利最丰、实力最雄厚的纺织纱厂,开近代天津大型纱厂之先河。它生产的14支优质棉纱织成的五福牌白布成为市场品牌。天津市民将老五福白布和三桃面粉作为保值的商品,它们的价格长期是天津市场物价指数的标准。

德国早在1895年就获得了1034亩的河西租界地,但没有开发,到1900年以后又向东向南扩展到4200亩,市政建设才逐步展开,并切入了德国的先进工业。1903年在穆姆路(现徐州道)建成德华印字馆,后改为北洋印字馆。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德堡印刷机,是天津印刷技术最先进的印刷厂。它能承担油印、铅印、胶印和印制精美的各种带照片的广告,为天津印刷工业的发展起了引领的作用。此时的德租界已有了经济的初步繁荣,德国人起士林与巴德尔创办了起士林西点铺,而起士林本人曾担任过德皇威廉二世(改为“远洋轮船上”)的厨师,他做的西点引起了天津中西各界人士的青睐。也是西方食品工业在天津的最早雏形。

1908年3月,津浦铁路北段开工,因起始站尚未定址先从良王庄修起,为卸下德国水运来的铁路器材和机车部件先在沿河陈塘庄修建码头和站场。因此津浦铁路所属的机车修配

车间在此落成。建设了车、钳、铸、锻、焊等各种一流设备,而后发展成津浦铁路局附属的机车修配厂——津浦大厂。它是天津第一个大型机械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天津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一次空间。因取水、排水和水运方便,1918年在小刘庄附近沿河地带建成“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该厂资本为560万元,织布机1000台,纺织能力为75000纱锭。工人最多时达6000人,每年产棉纱54000包,棉布641982匹,是天津乃至我国北方最大的纺织企业。1921年在挂甲寺附近又建成“北洋商业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其资本300万元,纺织能力28000纱锭,工人1600人,年产棉纱20000包。河西沿岸成为天津南部纺织工业带。

在1900年以后河西地区又诞生了一个为中国创汇达一个多世纪的地毯工业。先是先农公司在德租界大沽路建立的洗毛厂,用机械洗整羊毛。其西南方又建有武齐洗毛厂。小刘庄、谦德庄、三义庄和马场道以南区域的众多家庭妇女都在家手纺毛线,为地毯工业提供原料。到1916年天津有地毯厂13家,织机398架,而后快速发展。到1926年天津地毯出口已占全国地毯出口额的79.4%,够规模、产量大、质量优的地毯厂绝大部分集中在河西地区。其中有名的是:美资“乾昌地毯厂”是天津最大的地毯厂。它的出现激发了中国民族地毯业的崛起,1926年张庆林在徐州道建成“庆生恒”地毯厂并亲自携带翻译到美国进行商务考察和推销产品。在美期间,与新伙伴瑞海公司签订了4万平方米的地毯合同并吸纳了美国的先进洗、染、织等技术。成为中资化学染色、化学水洗,具有独立出口权的第一家中资地毯厂。其余像仁立地毯厂、东方地毯厂、玉顺永地毯厂、大丰地毯厂、渤海地毯染织厂等众多地毯厂家都集中

在河西地区。据外贸统计,下瓦房及周边地区织毯工人及为他们纺毛线的家庭妇女和专业工人在 1938 到 1939 年期间有十万多人。创造了巨额外汇。为以后的地毯工业打下江山,成为中国现代地毯业的摇篮和基地。

1928 年以后天津社会形势比较平稳,河西地区工业稳步发展。利津铁厂、同兴利铁厂等十几家小型重工业厂家相继建成。当时所用的车床、电机、锻炉等设备已很先进。而规模更小的机械、铸造、纺织等小工厂在小刘庄以北沿河地带大规模的出现。

日本经济侵华的战略催生了日资在河西大规模建厂

早在 1898 年日本已在英法租界西北部抢得日租界,但在《天津日本租界条款》附带了许多隐秘的阴谋。一为扩大租界创造条件,二是将德租界以南小刘庄附近 200 亩地划归日本专用码头用地。遂经中国政府交涉,土地收回但码头设施日本仍然掌控。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利用中国华北政局混乱之际强行在河西地区兼并中资企业和建立日资企业。1936 年收买了裕元纱厂。1936 年至 1945 年在该地区建立了规模大、设备新的工厂 22 个。其中有华北地区最大的现代化造纸厂——东洋制纸工业株式会社,即后来的天津造纸总厂。维新化学株式会社、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天津工场、协和印刷厂、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天津第一工场、兴亚钢业株式会社等工厂。这些企业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掘取大量利润,挤垮了中国的民族工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将日伪财产收为国有。此时河西区首次担当了新天津的工业区，而后依照天津市工业布局规划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首先对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全区有私营工厂900多家，但都规模小、布局分散，自1953年4月开始成批进行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1月份改造完成。其主要代表厂家有：北洋纱厂、新兴钢厂、华北化工厂、惠福木器制造厂、公裕化工厂、联华橡胶厂、大明钢厂、渤海化学厂、仁立蛋厂、仁立毯厂、大成五金机械厂、同华茂铁工厂、美亚织绸厂。到1956年1月14日又将规模极小的216家私营工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天津市决定在陈塘庄铁路以南及土城一带建设整片的新兴工业区。而后天津市的大批私营企业经合营改造陆续迁入此地。到1957年陈塘庄土城工业区已初具规模。1958年，该地区快速发展，一大批新型的重工业工厂建成。形成了大中型企业为主，门类齐全并附带仓储和铁路入厂的大型工业区。主要有：天津市第四造纸厂、天津感光材料厂、天津无缝钢管厂、天津工具厂、天津焊条厂、天津第二冶金机械厂、天津真美电声器材公司、天津渤海无线电厂、木材二厂和木器三厂等。这个发展历程使河西区成为天津南部工厂最集中、类别最齐全、技术最先进、经济贡献最大的区域之一。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75年。在1975年天津市进行工业布局规划时仍然将河西地区许多土地作为工业预留地。这些工厂生产的重工业产品支撑了天津工业的发展，轻工业产品成为三北地区人民乐于消费的优质产品。如：保温瓶、纯棉布和精纺细纱高档府绸；有些是优质军用无线电器材；染料和玛钢件闻名国内外；手工地毯成为国际工艺精

品。到1995年底,河西区共有市属企业544家,20多个门类,近100个行业。对天津的经济产值和对外地的支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天津工业布局调整,进行战略性东移。再加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新兴产业的兴起,许多工厂被关、停、并、转,迁出市区,为腾空后的陈塘工业区迎来了信息化时代的结构调整。

2008年,根据《市内六区土地平衡项目试点暂行办法》,此处规划为“陈塘科技文化园”。2009年更名为“天津陈塘科技商务区”,使其成为河西区重点打造的“八大功能区”之一。商务区总占地面积2.78平方公里,由微山路、珠江道、城市景观带、郁江道等合围而成,总规划建筑规模491万平方米,平均容积率3.94,预计总投资将近400亿元。在建设中,商务区以“总部基地、北方高技术服务核心区和天津文化传播中心”为产业定位,按照“3+1”发展模式,重点发展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楼宇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和总部基地。这是天津中心城区唯一一片较为完整保留下来的升级换代的工业区。老企业虽然已百年沧桑,它保留的工业遗产文化是河西区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

海河西岸中西文化交融与汇集的内涵

早在1917年德租界被收回并改建为天津特一区后,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典型的德式建筑群座座斜坡屋顶,披盖着红色鱼鳞瓦。和之前的大型建筑德国俱乐部再配以宁静的街道和院墙里探出的德国洋槐和紫藤在春天的花香,吸引了大批官

僚和富人在此过上寓公的生活。徐世昌、吴毓麟、曹汝霖、田中玉、孟恩远、龙觀光兄弟、萧振瀛、张廷谔、袁克定、杨度等老派名人都在此有宅邸。而侯德榜、俞平伯、乐达仁、雍剑秋等人都在此处完成着自己的事业。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也曾隐匿该地区。

河西教育发达,中学、小学、幼儿园、专科学校、外侨学校成龙配套。是中国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发祥地。1895年10月2日中国第一座新型大学——北洋西学学堂一等学堂在河西梁家园(今海河中学一带)诞生,同时这座新型大学的预科——二等学堂随之诞生,这是中国第一座公立中学。严复1896年创办的天津俄文馆,大营门是中国最早的官办俄文专科学校。天津民立第三十九小学堂(今土城小学)于1905年创办于土城村,是区内第一所新式小学堂。1907年德华普通中学堂(今海河中学)创建于原北洋大学堂旧址,是天津租界最早的中学之一。1908年由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金韵梅创建的北洋女医学堂(今天津医专)是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职业学校。1909年德国侨民会创建的德国侨民学校(今台湾路小学)是天津最早的侨民小学之一。1914年创建的圣功女学几经周折于1940年秋天,在马场道上的陶园原址建成新校舍,这座“圣功楼”保留至今,是新华中学所在地。现天津外国语学院院址是曾经享有“煌煌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之誉的天津工商大学原址,它于1921年创建于马场道。特别是40年代中期,该校人才荟萃,堪称与美国康乃尔大学相伯仲,居于天津各高等院校之首。其所属的“北疆博物院”曾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博物院”,其附中(今实验中学)与南开、耀华、官立中(今三中)齐名。